略论清乾隆年间宫廷修史的历史贡献

方瑞丽

内容提要　乾隆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府库充裕，为朝廷组织学术研究、图书编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乾隆年间官修书籍达200余种，其中具有镜鉴作用的史书编纂是最大部分，先后编纂了137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涉及领域之广泛，编纂体例之完备，资料价值之高，图书题材之拓展，编辑考订之全面，都是空前的。

关键词　乾隆朝　官修史书　文化政策

整理典籍、编纂前代历史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族封建政权，清代帝王对汉文化的吸收更为迫切，故而对传统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尤其重视，不仅朝廷设置了多重编纂机构，也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甚至皇帝还亲自参与或指导图书的编纂。在这种背景下，完成和出版了一大批内容丰富而系统全面的各类图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清人评价说是“钜制鸿篇，洵为前代所未有者矣”[1]。本文以乾隆朝宫廷编纂史籍的状况略作概述，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　以《国朝宫史》为标志的宫廷专史的编纂

历代官方修史，对于皇室私密空间的宫廷生活（包括建筑空间、机构设置、礼仪制度、文化活动等内容）少有涉及，流传较广的多是有心文人得知于见闻或传闻的笔记小说，如明末刘若愚《明宫史》、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而动用国家人力、物力，大规模地编纂当代宫廷史、对当代宫廷收藏以及文化活动进行系统整理和编纂相应文献，则自乾隆朝敕修《国朝宫史》始。

《国朝宫史》是清乾隆年间敕修的一部记述自清代顺治至乾隆朝内廷的典章制度、宫苑建置以及重要事件的史书。受乾隆皇帝敕命，该书于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编纂而成，乾隆二十四年，再令蒋溥等人详细校正、重加编辑，至乾隆三十四年底成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全书36卷，分别记录顺、康、雍、乾四代皇帝对内廷的训谕；内廷各项重大典礼制度，包括宫规、仪

‹1›　（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页163，中华书局，1982年。

卫及冠服制度等；内外宫苑的建制规模及皇帝题咏各宫苑的匾额诗文；内廷的经费开支，包括铺宫、年例、日用、恭进、恩赐等钱粮用度；内廷官制职掌、额数；清代内廷编纂刊刻的书籍等。

乾隆皇帝命儒臣纂修这部宫廷史，意在宣扬君德，并警醒子孙。他认为，明代非亡于宦官，使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主要是人君的过失。而清代自顺治帝入关，历经康熙帝、雍正帝及于己身，已百有余年，“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而“不有成书，奚以行远”？所以他决定纂修本朝宫史，就是要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守之弗替”“永永勿斁”[1]。旨在宣扬清代“君德之清明”，并使后嗣子孙有所遵循，知所警戒。《四库全书》中该书提要称：“编辑是书之旨，拳拳于立纲陈纪，聪听明训，为万万世遵循之本，盖修齐治平之道，并具于斯矣。”[2]

《国朝宫史》书成，遂成为其他官修图书的重要参考资料。乾隆三十九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120卷，其中苑囿等门，有些内容就参考这部宫史。就是后来纂修的《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书，也同样照搬其中的部分内容。可见其资料之博洽翔实、可靠，非一般史书笔记可比。后来，嘉庆皇帝于嘉庆五年（1800）命大学士庆桂、王杰、董诰、朱珪、彭元瑞、纪昀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将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内容编入该书。体例上仍遵循《宫史》的六大门，子目略有增加。如《续编》中《训谕》一门，收录的主要是约束太监的谕旨，但还收录了一些教育皇子的谕旨。《国朝宫史续编》凡100卷，篇幅增加了近一倍，堪称乾嘉时期清宫史料集大成之书。

同样出于“以垂示方来”[3]的目的，乾隆年间还饬令编纂了多种主要记载宫廷生活的图书，如《皇清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古今储贰金鉴》《八旬万寿盛典》等。这些书籍如今都成为我们研究清代宫廷史、清代礼制的重要的首选资料。

《皇朝礼器图式》是记载清代典章制度器物的政书，完成于乾隆三十一年。全书18卷，目录一卷。该书图文并茂，分为六部分：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每一件器物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每件器物的详细尺寸、质地、纹样以及对应官职品级，无不条理清晰，记载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该书：“所述则皆昭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寸无讹，圣世鸿规，粲然明备。”对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典章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源远流长，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前，爱新觉罗氏即以堂子为萨满教活动之所。清入关后，仿盛京城外东南堂子之制，于紫禁城东南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并仿盛京清宁宫改建坤宁宫，将萨满教信仰习俗带至北京。然至乾隆朝已百有余年，讹误不少。为使满族的信仰习俗能保留久远，以维系满族之团结，并昭垂万世[4]，乾隆帝特敕庄亲王允禄等人，将满族各种祭祀仪式、祝辞进行收集、诠释、整理，详细考订，汇编成文，并将祭器等绘成图画，于乾隆十二年成书。乾隆帝钦定书

‹1› （清）鄂尔泰、（清）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首“圣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页5，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

‹3› 乾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首“提要”，《四库全书》第675册，页341。

‹4› 《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卷首，乾隆上谕，《四库全书》第657册，页619－620。

名《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为之作序，以满文印行。乾隆四十二年，又命大学士阿桂等将其译成汉文，四十五年收入《四库全书》。

全书共六卷，卷首有乾隆十二年高宗关于满文《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成之上谕，次为承办、监绘、誊录该书之诸王大臣、官员等职名，再次为目录。卷末有乾隆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于敏中等奉旨将满文译成汉文编入《四库全书》之跋文及奏折。全书备载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等各种祭祀活动之祭期、祭品、仪注、祝辞及所用器皿形式图等，是对满族萨满信仰礼俗的总结，更是研究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及满族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

自雍正年间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后，清代皇嗣继承制度基本确定下来。但乾隆帝早期确定的继承人皇次子等先后早殇，引起朝臣的担心和猜测，乾隆帝为自己迟迟不确定继承人而辩护，因此于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选取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按朝代纂辑《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选自周朝讫于明朝33事，又附见五事。而自春秋以后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储贰可比者，间叙其概于案语中。纪事取之正史，论断衷诸《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及《通鉴辑览》御批。目的仍是使"我子孙当敬凛此训，奉为万年法守"[1]。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因《四库全书》编修告成尚待时日，命儒臣将校辑《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传。同年十月，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奏准：因刻书种类繁多，付雕不易，不如刻做枣木活字套板一份，摆印书籍"工料省简悬殊"。遂于乾隆三十九年刻木质单字25万余个，并开始摆印图书。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而赐名"聚珍"。其间，用这套木活字共摆印了131种书，后来嘉庆七年、八年间又摆印了《西汉会要》《唐会要》《农书》三种，前后一共摆印了134种。后人称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书》。

《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刊刻，是我国古籍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继承和总结了宋明以来各种活字印刷术的成果和经验，把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推向了发展的高峰。此书问世后，由于收录的都是罕见的珍籍，各省几乎都照式翻刻，形成了所谓外聚珍本，影响极大，对促进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总结经验方法，主持人金简编撰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2]。该书第一次从理论上概括总结了活字制作、刊印的全部工艺流程，言简意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不仅在清代广泛流传，而且被译成德、英等国文字，流播海外，为推动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八旬万寿盛典》是为纪念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岁生日庆典活动而作。乾隆五十四年，大学士阿桂等奉旨编纂，以记录乾隆帝八旬生日庆典的盛大景象。至五十七年十月全书编纂完毕。全书120卷，首一卷。分为八类：《宸章》收录乾隆帝古稀之后的御制纪念诗、文，间附编者按语；《圣德》是对乾隆帝敬、孝、勤、仁、文、俭、谦诸方面德行的记载和恭奉词；《圣功》阐扬乾隆帝七旬之后平定安南、缅甸、廓尔喀、台湾、甘肃等地的武威战功；《盛事》记载皇室五世同堂、民间户籍增加、百姓增寿、粮食增产及赐千叟宴、

‹1› 乾隆《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卷首"上谕"，《四库全书》第694册，页6049。

‹2› 参见《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提要"，《四库全书》第673册，页709－710。

科第职衔、辟雍讲学、班禅入觐等情况；《典礼》是有关贺诞过程中的庆祝、朝会、祭告、銮仪、乐章等；《恩赍》，记录当年的恩诏、蠲赋、恩科、东巡、恩宴、赏赍等情况；《八旬万寿盛典图》；《歌颂》，辑入皇子、臣僚、生监等的祝嘏之词。书成，补入《四库全书》中[1]。本书虽多溢美之词，却保留下当时的历史活动实际，以及典制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清史的必要参考资料。

伴随《国朝宫史》等宫廷典章制度史编纂工作的展开，乾隆帝还饬令翰林对宫廷收藏的前代书画编撰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等著录类图书。对于内廷收藏的尊、彝、鼎、鼐等器物，乾隆帝敕令廷臣编撰了《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等大型图录，对研究古代青铜器具有重要价值，成为后世文物图谱编纂的范本。其中《钱录》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钱币的著作，成为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一部最重要的参考书。

可以说，乾隆年间，伴随着《国朝宫史》等图书的编纂,清代官方对宫廷建筑、苑囿、内廷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度、典制、经费、收藏品与文化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录，为后代研究宫廷文化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清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形成了宫廷学研究的雏形，为现代宫廷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重视边疆史地、民族习俗研究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代统治者，表现出对边疆史地、民族习俗研究的异常重视，敕命大臣编纂了大量有关边疆史地、民族习俗的典籍，成为今天研究边疆地区民族历史、地理沿革等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也为今天捍卫领土主权完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法理依据[2]。

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计250卷，是有关清代八旗制度和八旗人物的专门志书。编竣于乾隆九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图一〕计80卷，辑录了除清代皇室以外的满洲姓氏，详细记述了其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官阶及勋绩等情况。是了解清代前期历史，特别是八旗人物、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满族源流的重要史料和工具书。乾隆四十二年，阿桂、于敏中、和珅等奉撰修，次年完成的《钦定满洲源流考》20卷，是清代官修满族先世及其有关东北诸民族的重要史籍，内容包括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该书从正史以及其他近五十种典籍中选择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并进行详尽考证。对研究女真和满族历史来说，不失为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专题类书。

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完成的《皇清职贡图》九卷〔图二〕，图文并茂，将境内不同民族，以及与清王朝有来往的国家之民族，描绘其衣冠形貌，汇编成书。是研究了解此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以及当地风土民情的重要文献。

‹1›　《八旬万寿盛典》卷首“进表”，《四库全书》第660册，页1—5。

‹2›　乔致忠、侯德仁：《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考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110、112。

〔图一〕《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图二〕《皇清职贡图》



此外，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五年编纂成书的《大清一统志》426卷、九年敕纂的《钦定盛京通志》130卷，以及《热河志》《琉球国志略》等，都是了解和研究清代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史地变迁的重要参考文献。

为了纠正《辽史》《金史》《元史》人名、地名译音的“讹舛俚浅”，乾隆四十七年还敕命编纂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46卷，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语正《金史》，以蒙语正《元史》，各注其名义，详其字音，是研究《辽史》《金史》《元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是，伴随新疆正式纳入版图，乾隆二十一年开始纂修，四十七年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图三〕凡48卷，卷首四卷，约60万字，是清代新疆第一部官修通志。该书除采自档案外，还兼用实地调查勘测资料，为《大清一统志》新疆部分之所本。乾隆二十八年，新疆第一部地名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编成，是一部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蒙古文等6种文字的人名、地名的对译辞书。全书按地区编排，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地名、山水名及准噶尔部、回部等各部上层人物名的解释，分为天、地、山、水、人五类。每一词条都用六种文字对照，首列满文，次列汉文，并详注词义，其次用汉文标满文标准音，再排列蒙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各注译语、对音。本书是为扫清语言障碍、巩固西北边疆统治而编撰的工具书，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

对于这两大巨著，乔致忠教授等人曾评价说：清朝纂修《西域图志》是对新疆实施经营管理的需要，但其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将实地勘察、历史考订、官方文书结合参证，对西域地区的新知所得极富，所纠正的旧说讹误甚多，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性。它以52卷的篇幅，将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物产风俗、文化教育靡所不备，特别记载清朝经营新疆的各项措施和成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此后纂修《大清一统志》《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等所吸收。……时至今日，我们从史学史、民族史、地理学史、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等各个角度探讨，这部《西域图志》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

三　对典章律例的高度重视

到乾隆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发展至高峰，各项制度都有集大成特点，为传至后世永永遵守，以为范

‹1›　前揭《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考析》；另参考，牛海桢：《清代官修西北边疆史志述论》，《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2期，页71－75。

〔图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图四〕《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



〔图五〕《平定台湾纪略》



式，乾隆帝多次敕命将当朝各项典章律例、重大事件等编辑成册。这些典籍，既有对历史上各项政治制度沿革的系统梳理，更多地则是对当时各官衙行政法规的真实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相关历史问题，特别是清代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政权运作等重要问题的宝贵资料。

乾隆四十六年编纂的《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图四〕，记载了乾隆三十一至四十一年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反清事件始末。《兰州纪略》20卷，首一卷，记录了乾隆四十六年镇压甘肃循化厅撒拉回民苏四十三等策划的新教起义始末。《平定台湾纪略》65卷〔图五〕，首五卷，记录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次年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田天地会起义始末。这些都是研究乾隆年间重大战事的重要文献。

“十通”中有六部是乾隆年间修成的。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的《续通典》150卷，记载了唐朝肃宗至明末的典制；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完成的《清朝通典》100卷，记载清初至乾隆中期的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续通志》640卷，记载唐初至明末的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通志》126卷，记载清初至乾隆末年的典制；《续文献通考》252卷，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文献通考》300卷，记载清初至乾隆五十年间的典制。自此，凡“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得失，条分件系，纲举目张”[1]，历代典制之沿革得以梳理。

为镜鉴历史，这一时期还敕撰了一些历史读本。如乾隆三十三年敕撰的《历代通鉴辑览》116卷，全书编年体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书中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有乾隆四十年敕纂的《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40卷。此类史书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上都很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纲鉴易知录》那样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资治通鉴》那样篇幅浩大，头绪繁多，难于卒读。是清代通行的历史读本，甚至民国初年也颇为流行。

此外，乾隆时期还编纂了不少专门志书。如乾隆四十三年敕撰《钦定国子监志》62卷，分为：《圣谕》《御制诗文》《诣学》《庙制》《祀位》《礼》《乐》《监制》《官师》《生徒》《经费》《金石》《经籍》《艺文》《识馀》《纪事》

‹1›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钦定续通典》提要，页2130，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缀闻》等类，涉及国子监相关活动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文教事业的重要参考书。

〔图六〕《钦定大清会典》



乾隆年间还敕令编纂了多部衙门运作则例，犹如当代的行政法规职能。如乾隆二十九年敕撰《钦定大清会典》100卷〔图六〕，《钦定大清会典则例》180卷；三十四年纂成的《钦定户部鼓铸则例》10卷，《钦定户部旗务则例》12卷；三十四年编纂《钦定太常寺则例》121卷；《钦定光禄寺则例》85卷；四十一年阿桂等纂《钦定户部军需则例》10卷、《钦定兵部军需则例》5卷、《钦定工部军需则例》1卷；乾隆四十五年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户部则例》127卷；四十八年纂成《钦定礼部则例》195卷；六十年《续纂则例》32卷。还有：《钦定国子监则例》32卷、《钦定学政全书》82卷、《钦定科场条例》59卷、《钦定中枢政考》31卷；《钦定八旗则例》12卷，等等。众多行政法规，其体例比较完备，有典则分例、考订精详等特点‹1›。既有制度规定，更有鲜活的事例，为我们研究国家政权运作等问题，无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　余论

其实，乾隆年间宫廷修书还有很多成就，涉及掌故、字书等诸多方面。清人朱彭寿曾非常自豪地说："历代官撰诸书，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最著，然亦不过数种而已（唐之《文馆词林》，明之《永乐大典》均遗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编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有《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此外，于字书、青韵、正史、编年、史事提要、历代通制、地理、农政、医学等，"皆经诸名手，上秉圣裁，精心撰述，不独嘉惠多士，且将昭示方来，钜制鸿篇，洵为前代所未有者矣"‹2›。其中的大多数典籍都是乾隆时期的成就。

所以《清史稿》对此评价说："清代肇基东陲，造创伊始，文教未宏。太宗首命大学士希福等译辽、金、元三史，逮世祖译史告成，二年又有议修明史之诏。惟其时区宇未宁，日不暇给，是以石渠之建，犹未遑焉。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继修《明史》，复纂诸《经解》、《图书集成》等书，以网罗遗逸，拔擢英才，宏奖斯文，润色鸿业，驯致太平之治，而海内彬彬靡然向风矣。……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

‹1›　赵静：《乾隆大清会典编纂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王记录）。

‹2›　前揭《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页162－163。

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1]

对于最高统治者干预官修图书，尽管多有抱怨和批评，但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2]。因为编纂大批高质量文献，不仅需要众多的专门学者，更需要大量的金钱，有最高统治者倡导并亲自参与其间，为图书编纂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物质坚实基础。

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卢文弨曾论及四库馆开办及戴震入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说：“天子开四库馆以网罗放矢，雠校之司，必得如刘向、扬雄者方足以称上旨 。东原用荐者，以乡贡士起家，入馆充校理。命与会试中试者同赴廷对，洊升翰林，天下闻之，咸喜以为得发抒所学矣”[3]。洪亮吉也注意到社会稳定局面、四库全书编纂对学术昌盛的影响，他说：“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4]所以《清史稿》称赞说：“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5]宫廷编纂活动的开展，无疑对全国范围内学术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不少学者也乐在其中。如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的词臣张若靄得意地说：“入春以来奔走内廷，踏星披月，眠食都捐，却幸奉敕品定内府书画，盈千累万，日与古人为徒，烟云供养，别有会心，籍此以尝马足之劳，忘其苦焉。”[6]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续编》的词臣王杰等也曾说：“臣等以缮校微劳，既获寓目于壁府之藏，复得挂名于宝书之末，其为荣幸曷有涯矣！”[7]自豪感溢于言表！

也正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倡导并亲自参与其间，从而保证了这些官修图书的权威性，也成为今天我们从事文史研究的最重要参考文献。清代官修史学，特别是乾隆年间的图书编纂成果是划时代的，集中国传统经籍典制之大成，它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一》，页4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王记录：《帝王史馆官方史学：从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看官方史学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六《戴氏遗书序》，中华书局，2006年。

‹4›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中华书局，1912年。

‹5› 《清史稿》卷四八六《儒林传序》。

‹6› 《晴岚诗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九册，页67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 《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凡例，页17。